

武康县中学教育开创史

汪 家 诤

1937年7月7日，芦沟桥事变爆发，全面抗战形势已定。8月13日，日军侵略淞沪，上海的资产阶级在莫干山有房子的纷纷上山，一为避暑，二为避战祸，青年学生到山上来的为数不少。当时居住在莫干山上的沈亦云（黄郛夫人），为了使到山上来的避难的青年学生能够就学，于1937年8月，创办了私立莫干中学。学校负责人张镜心，兼任语文、英语教师，张惠衣任语文教师，章子昆任英语教师，我任数理化教师。校址在莫干山芦花荡白云山庄。入学学生有八九十人，分三个班级。学生中有蔡时若（上柏人），杜维恒（杜月笙子），张长飞（张啸林子）。另一个班级在汪庄，都是16岁左右的小姑娘。到11月，因战事吃紧，大家纷纷避难，学校停办。

湖州、杭州相继沦陷后，莫干山上的资本家已逃避一空，沿京杭公路一带的小资产阶级纷纷到莫干山避难，因为山上有外国人（如美国传教士Mrs White及Schlitz）组织救济会，秩序较安定。1938年1月，东吴附中在山上开办临时分校，原东吴附中校长陆某任分校校长，东吴附中部分教师在分校任教，还聘请了在莫干山避难的三名教师：沈克纪（英语教师）、钱渭川（语文教师）和我（数、理、化教师）。分校校址在莫干山基督教礼拜堂。学生对象大都是莫干山四周小城镇的居民子弟。到1938年夏，东吴附中分校集体去上海，只留下沈、钱和我三个教师。我们三人与莫干小学杨宠如、陈锦枚等组织起初

中教师班子，继续教学。8月，学校由国民党武康县政府接管，改名武康县战时初级中学生补习学校，校长张镜心，教师有钱渭川、何健春、徐则达、陈锦枚、杨宠如和我，事务主任龚荣名，事务员李异白。经费由校长与在瑶坞的国民党武康县县长吴永山联系，归县政府筹拨。校址仍在礼拜堂，1940年春迁莫干山铁路旅馆。

1941年1月，张镜心调县政府秘书，徐则达接任校长，学校迁后坞天泉寺。当时，德清县长朱希和徐则达有鉴于路东德清、崇德、桐乡三县尚有一批青年失学，并为扩充学校经费来源，经浙西行署批准，改名武德崇桐四县联立战时初中学生补习学校，新添朱福基、王永孟、李大风（语文教师）、吕乐箴（数学教师、朱希之妻）、潘维德（童体教师）、陈震芳（图画教师）、王古蕃（事务员）。

日军侵华后，日美矛盾逐渐加深，日本侵略野心增大，对中国实行以战养战，为发动太平洋战争作准备。这时，国民党武康县县长由杨维礼接任，他魄力较大，仍由武康县独力承办这所学校。1941年年底，学校更名武康战时初级中学。校长由杨宠如担任，教师基本上是原来的，仅童体教师改由上海新来的刘老师接替。当时，日军袭击了珍珠港，各处捕捉美国人。莫干山上的美国人早已回国，日军上山捉人，在塔山架起火炮，轰击后坞天泉寺，校舍被毁。1942年，学校迁安吉晓村，第二学期由赖阳光继任校长。这时，我离校去孝丰彭宅中正中学教书，武中学校情况不详。

1943年，校长由国民党武康县政府教育科长沈厚润接任。校址仍在晓村。因学校缺少我这样的数理教师，学生对杨宠如意见很大，事实上我是为安全起见才离开的。县长杨维礼知道后，托人传信，亲自召见我，要我留在武康战时初级中学工

作，我答允了。

（作者系上柏人，浙江大学教授，已退休）

【附录】参考资料（兼存异说）：

（一）1937年秋，湖州东吴附中迁莫干山办学，是年冬停办。1938年春，沈亦云因感留下的学生无处求学，于是接手办莫干山临时补习中学。……1944年春，校长蔡锦远，校址莫干山工部局。（原该校学生汪祖镕）

（二）1942年秋，武德崇桐四县联合中学诞生，校址设在安吉县晓村何家祠堂，来自安吉、孝丰、武康、德清等县的住校生200余名，分长虹、晓鸽等4个班级……校长赖阳光，广东人，美国留学生，和蔼可亲，知识广博。副校长沈厚润，教师汪家诤、胡汉亮、刘一平、杨一农等十几位……1944年迁莫干山，校长由县长杨维礼兼，副校长蔡锦远，教师杜瑞芾、林夷如、陈官方、汪家诤等，校名改为武康中学。1945年又迁杨坟资福寺。一学期后又迁宋村关帝庙，改为简易师范，直至解放。（上柏中学俞震海）

（三）民国二十七年春，有吴兴东吴附中、湖郡女中等学校，迁来县境莫干山，暂驻复学。是年秋，该校等相继后撤，大部分学生未能随往，于是黄膺白夫人沈亦云邀张镜心、汪家诤诸先生于莫干山创立莫干中学。嗣以私人财力有限，呈请县府补助，呈准改名为武康县立战时初中学生补习学校，校长由县长吴永山兼住。二十八年八月，委张镜心为校长……三十二年春，奉令改组为武康县立初级中学，委沈厚润接任校长。三十三年春，沈氏辞职，委蔡镜远接充。三十三年八月，改组为县立简易师范学校，由县长杨维礼兼任校长，迁址莫干山。三十四年春，暂时停办。是年秋，杨氏去职，县长张洪仁率师生

复校杨坟，委杜颂南（瑞芾）为校长。三十五年春迁宋村。是年秋，由魏宇澄接任校长。（《武康简师校史》，载民国37年6月15日《武康简师通讯》创刊号）

附：武康县战时初级补习中学校歌

张镜心词 ××曲

我们是最前线的学校，
我们是最前线学生，
猛烈的炮火锻炼着我们的心身，
我们要在火线下，
养成科学的头脑，
劳动的双手，
无畏的精神！
看，北面的太湖，东面的钱江，都泛着鲜红的血浪；
看，江湖环抱中的家乡，只剩了荒烟蔓草、断井残墙！
早晚的眺望，这深仇似海洋，永不能忘，永不能忘！我们要发愤学习，勤劳双手，立功沙场。
我们的前途似锦，灿烂辉煌！

（该校学生汪祖镭等回忆提供）

武康县第一所中学

柯 则 夫

1938年，在抗日战争的硝烟中，武康县历史上第一所中学在莫干山诞生了。这所学校曾经三易校名，三迁校址，坚持前线办学，长达七年之久。

抗战前，五万人口的武康县，没有一所中等学校。抗战爆发后，县境内的避暑胜地莫干山，虽距日寇据点三桥埠不足二十华里，但敌人要登上海拔七百余米的莫干山，终究需要相当时间，所以一时成了较为理想的避难场所。避难的人有本县的，也有来自德清、杭州、嘉兴、吴兴和长兴等地的。当时，著名的莫干小学已从山麓庾村迁到莫干山上复课，于是群众热切盼望能创办一所中学，以便让小学毕业生有升学机会。幸亏避难者中不乏人才，师资问题完全可以解决。莫干山临时补习中学就此应运而生。第一任校长为张镜心。

1940年下半年，从安全角度考虑，学校从莫干山迁到山麓后坞，改名为武（康）、德（清）、崇（德）、桐（乡）四县联中，徐则达继任校长。由于四县合办，经费较前充裕，教师队伍扩大，学生人数增至近二百人，是学校的全盛时期。

后坞虽比莫干山距敌稍远，但敌人仍时来窜犯。不得已，学校于1942年初迁到丛山环抱异常偏僻的安吉县晓村，改名为武康县立初级中学，校长为杨宠如。学生减到百人左右，仍是三个班级。

武康中学虽然规模较小，但课程设置齐全，师资力量较

强，学生积极学习，教学质量堪列中等偏上。如果说，办好学校一靠教师，二靠设备，那末该校的教学设备几乎是零，主要依靠一支热爱祖国、学有专长、乐于培育人才、根本不计报酬的教师队伍。例如当时执教数理、后来成为我国著名力学教授的汪家诤，他教课深入浅出，一丝不苟。由于学校连最简单的实验仪器、分析太阳光谱的三棱镜也没有，汪老师便对着阳光喷水以现七色，有时自己衣服喷湿，也全然不顾。再如执教国文的钱渭川，因为没有课本，他自编选教材，自刻讲义，除了教传统的范文，又教宣传抗日的时文。他教的向平《把青春付与战场》一文中的警句：“在歌舞樽前繁华镜里看到的青春是虚的，在户牖之下槽枥之间看到的青春是假的，我们只有把青春付与战场”，曾在学生中广为传诵。又如执教英语的徐则达，英语基本功扎实，对学生要求严格，除了教课，还组织学生进行英语朗诵比赛，以提高教学质量。

随着学校三迁，师生的生活条件也有变化。在莫干山，学校设在京沪杭甬铁路局的铁路饭店，住的是洋楼，睡的是钢丝床，条件十分优越。在后坞，假天泉禅寺为校舍，生活条件自然远逊莫干山。到了晓村，只能在祠堂里上课，学生寄宿民家睡地铺，条件更加简陋了。不过当时物价一般较平稳，学生的伙食质量不算太差。电灯当然没有，晚自习就点蜡烛或煤油灯。

身处前线的师生，耳闻目睹甚至身受日寇的暴行，抗日情绪十分饱满。一个时期，每天早会和饭前，学生都要列队高歌“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……”、“我们在太行山上……”、“工农兵学商，一起来救亡……”等歌曲。也曾课余下乡，进行抗日宣传和演出。学生非常关心时局的发展，但当时听不到广播，《民族日报》、《浙西日报》也难得看到，于是常请长

于口才和善于分析的教务主任陈锦枚作时事报告。某次，陈老师绘声绘影地讲述“箬帽兵（指国民党62师某部）痛歼敌寇的战斗，听者情不自禁欢呼雀跃。1940年夏，国民党192师与日寇在高峰山区激战五天四夜，战场与莫干山的直线距离才六、七华里，两军炮弹射出炮口时的火光都清晰可见，炮弹的爆炸声更是震天动地，山鸣谷应，但师生们镇定自若，居高临下，密切注视战局。入夜，年纪较大的学生参加救护队，冒着生命危险，从火线抬回伤兵。“山下炮声隆隆，山上书声朗朗”，可谓对这所学校的真实写照。师生们还练就一副快速反应的本领，无论日夜，敌人来袭，即刻转移，不作无谓的牺牲。

还值得一提的是，1941年，浙西全区中学生运动会在天目山隆重举行。徐则达校长亲自率领武康中学篮球队，步行四天，前往参加比赛。

武康中学是我的母校，我于1939年入学，1942年毕业，三年初中生活是终生难忘的。据说抗战胜利前夕，学校又迁回莫干山，并附设简师班，详情我就不了解了。

（作者系《解放日报》主任编辑）

抗战初期的一朵昙花——新市中学

高 鄂 芳

花，总有她自己的特色，而昙花，则由于洁白柔丽和生命的短暂而更为人们所珍惜。

抗日战争初期的新市中学，正可喻之为一朵不同寻常的昙花，刚绽出她那绮丽花冠的时候，却遇到了骤然而至的狂风暴雨，瞬息之间被摧残殆尽。其生命虽短暂，但终于给新市镇留下了一丝可贵的陈迹，也在新市人民心中增添了一缕留恋惋惜之情。

抗战初期的新市中学，是德清县有史以来第一所具有相当规模的中等学校。她诞生于中华民族遭受空前浩劫、抗击侵略者烽烟迭起的1938年8月。她能在这个非常时期中突然诞生，体现了那时新市镇上爱国人士敌忾同仇、振兴民族教育的豪迈气概和良苦用心。

“七七”事变后，我沿海城市首先遭到敌机的狂轰滥炸，敌军相继大举南犯，我国东南半壁岌岌可危，上海与杭嘉湖地区的大、中学校，或内迁，或疏散，而新市镇则由于所处地理位置优越（属水网地带），而且物产丰富，民风敦厚，被视为可偏安一隅的世外桃源。于是，在外地工作的新市人和闻讯而至的外地人，均为了避难而纷至沓来。其中有执教于外地的教育界人士，也有就读于外地的青年学生。当时新市镇上人口猛增，市面繁荣，大街小巷，熙熙攘攘，所以有人誉新市为

“小上海”。然而在这国难当头、国土沦丧的时刻，这种繁华景象毕竟是畸形的和暂时的。真正关系到民族兴衰的文化教育事业，则被无情的战火吞噬净尽。一方面教师们失去了用武之地；另一方面莘莘学子求学无门，而在颠沛流离中蹉跎岁月。在如此苦痛现实面前，一种“国家兴亡、匹夫有责”的强烈心情激励着每一位以教育为己任的有识之士。他们鼓励自己决心为解决地方教育问题而贡献力量。他们悉心研讨，积极筹备，奔走呼吁，不辞劳瘁。不数月，一所颇具规模、师资力量雄厚的“新市中学”迅速而庄重地宣告成立了。

筹备工作能如此迅速是有下列原因的：第一、新市籍老师出以地利人和的关系，责无旁贷地担当主要筹备任务，他们不辞艰辛，奔波筹措；第二、开办这所中学本无政府拨款，又无其它经济来源，幸有新市镇商会竭力支持，给予大部分资助；第三、事有凑巧，此时有商贩从杭州停办学校贩运校具教具来新在西庙设摊出售，中学筹备人员就选购了一部分课桌椅、标本、仪器之类，得以及时供应使用。

当时创建并任教于新市中学的教育界人士有：钱翼民（一名吉昌，1891——1981，新市人，上海沪江大学毕业，原执教于上海，系上海惠灵中学校长），学校主要创始人，校长。几位主要的老师是：陈新甫（名振扬，新市人，原执教于湖州中学）、施瑛（字慎之，新市人，原执教于嘉兴秀州中学，后任上海启明书局编辑）、张霁采（名楫，新市人，原执教于杭州之江大学化学系）、程乔治（新市人，原执教于上海）、王禾（杭州人，旧中国著名运动员，曾参加国际性运动会，当时任浙江航空学校体育教练）。

新市中学校址择在镇东栅的之江小学旧址。学校由于创办时间仓猝，某些方面也只好因陋就简，可是办得有条不紊。全

校共设四个班级——初一、初二、初三和高一，均是单式教学，课程均按普通中学规范，各科俱开，而且还备有简单而必要的生物标本、理化仪器以及各类图书，并设有音乐室、运动场等等。

全校男女同学一百余人，他们都是曾经受过失学痛苦的青少年，如今得到重新入学的机会，如久旱逢甘霖，个个欢欣鼓舞，发奋求学。老师们经过筚路蓝缕的历程，而今重登讲台，无不兴高采烈。循循善诱、诲人不倦的教导，犹似春风化雨，滋润着复苏的禾苗。老师除严谨治学之外，还辅导初二、初三两班同学办起了《潭音》、《新声》两个周刊（墙报），以鼓励学生课外写作（墙报内容着重宣传抗日救亡）。园地虽小，却起到了一定的宣传和教育作用。学校还谱有一首《校歌》，歌词（附后）内容以努力学习、身体力行、和衷共济、雪耻报国为中心，体现了当时的办学宗旨，颇受广大师生喜爱，有些同学而今已逾花甲之年尚能背诵。

正当学校办得生气勃勃、迈着雄健步伐前进的时候，无妄之灾，突然降临。农历九月十八日（1938年11月9日）这一天上午，同学们还在课堂静聆老师讲课，不料中午过后，敌人的炮弹打进了新市镇，接着，一批敌军疯狂地冲到镇上，残酷地见人就杀，一百数十个无辜居民惨死在敌人屠刀之下。从此，全镇人心惶惶，部分居民携眷外逃，也有不少老师和同学相继迁离了新市。新市中学就在这腥风血雨之中无声无息地不解自散了。

新市中学这朵瑰丽的昙花，从初绽到凋谢，时间虽极为短暂，然而她毕竟是在那抗日战争的峥嵘岁月里，为民族教育事业奉献过绚烂的光彩的，她留给我们的是美好的回忆和无限的惋惜！

附：新市中学校歌（歌词）（注一）

史传南渡，地著三潭（注二）；
四方负笈来从，事业贯融通。
读经明耻，习史知勇；
力学力行，履仁蹈忠。
听鸡鸣风雨如晦，任艰险舟楫是共；
尝胆卧薪，古越之风。
愿吾侪恢宏识度，
试望五湖瀚漫，白浪荡心胸。
更西望云山万叠，戒旦顷动，
拂拭起舞，气自雄。

（注一）歌词由当时同学根据回忆背诵写成。

（注二）向传三潭、九井系新市古迹。

不计平凡与艰苦

——记一所倾向进步的小学校

汪 霖

塘泾，是在东苕溪西险大堤边沿上的小集市。这里的塘泾陡门，是水路交通的咽喉要隘。

1937年冬，武康、上柏、德清县城和塘栖、瓶窑等城镇先后被日本侵略军占据，塘泾处在敌据点四周包围的沦陷区，经常遭受日寇的骚扰，局势混乱而复杂，老百姓在苦难中惶恐度日。

塘泾原有一所初级小学，青年教师程浩，本地人，本来就在这所学校里教书，是个勤恳办学的教育工作者。在这严峻的战争环境里，程浩有心及早恢复学校。但由于这里贴近德清城的敌军据点，苕溪水道常有敌军汽艇游弋过境，学生家长担心自己的子女集中起来读书有危险，因此学校难以复课。正当程浩一筹莫展之际，1938年秋，浙江省政府直属战时政治工作大队的进步青年程步、肖明夫妇首先深入沦陷区，从事抗日救亡宣传活动。他俩到达塘泾遇见程浩，双方谈得很投机，经过商量，决定先把学校恢复起来。于是广泛征求学生家长意见，拟订了学校应急的具体措施：（一）设置报警信号：离学校南面二百米处有幢高楼，从楼上可以望见四郊数里方圆的动静。这楼的窗口挂着一只普通家用的竹篮子，篮子挂在那里，表示平安无事；如果篮子不见了，就是日寇来扰的报警信号。（二）预备着临时应急的课堂：学校得知报警后，就由教师把学生有

秩序地分散到几个偏僻自然村的民房里去上课。这些村落四面环水又远离主要河道，没有船只就不可能进村去，并有专人爬在村头的大树上瞭望放哨，让师生们安心教学。（三）在日寇大肆骚扰期间，按照学生的居住地点编成小组，以三五个同学聚集在家里由老师辅导学习。在这种特殊情况下，只教语文和算术，作业各自带回家去做，主要为了不使文化课教学中断。自从认真实施了上述具体措施，很大程度上解除了家长们的顾虑，因此来校就读的学生逐渐增多。塘泾小学早在1938年的秋季首先恢复上课，这在原武康县沦陷区是最早出现的战时学校。不过要把学校维持下去并且办好，是不容易的。由于学生程度参差不齐，全校只分编两个班级，暂设语文、算术、图画和唱歌四门课程，其他时间组织学生课外活动。教材全部由教师自编自印。课程内容很生动而有现实进步意义。如低年级语文的第一课“大、中、小”。第二课“大中国，小日本”。第三课“日本兵，真黑心，杀人放火想把中国吞”。以此渐次深入，把抗日救亡的道理向孩子们逐步讲清楚，好让他们回家去向大人们作宣传。女教师肖明教唱的是救亡图存的进步歌曲，如《儿童队队歌》、《我们是小小宣传家》等等。师生们不但在校内齐声歌唱，还在晚饭后由肖老师带领着到村里去唱给群众听。逐渐地许多青年农民对抗战歌曲感到了兴趣，她就因势利导，组织起“抗日青年歌咏队”。与此同时，又有陈烈生、伍廷华、严克等省政工队人员相继来到塘泾，他们都是具有较高文化程度与较强工作能力的进步知识分子。这时的青年教师程浩对办好塘泾小学感到信心十足。大家在学校教育搞得有声有色的同时，由伍廷华建议开展成人识字教育，程浩本着爱国正义感，当然全力支持。先后在塘泾、四都一带开办“民众夜校”和“妇女识字班”。课本都是自编自印，主要内容是抗日

救亡并进行唯物主义的阶级教育。经过数月的努力工作，极大地鼓舞了沦陷区人民群众抗日救国的信心和决心，许多人从而提高了革命的阶级觉悟。中共在塘泾一带的地下党组织，就是在这期间建立的，主要活动地点也就在塘泾小学。当时党内认为程浩是进步开明人士，属团结对象。

可惜好景不长，1939年5月，程步、肖明夫妇奉命前往天目山，说是奉召去“开会”，不料程步此去就被特务杀害，遗下肖明老师非常凄凉地返回上海老家。陈烈生、伍廷华、严克等进步青年亦及时撤离。

1940年，塘泾小学改为泾溪中心小学，由程浩任校长。这年暑期，有谢中波、周静波来到塘泾（由原在塘泾活动的省政工队人员暗中介绍），他二人没有公开身份又无固定职业，由程浩安置他们在学校里教书，并与原在校的二位教师协商，以三名教员的工资来维持五个人的生活。如今，谢中波本人在回忆当时的情况时，作如下记述：“从此我与周静波白天教书，晚上进行地下活动。我们在工作中得到程浩的同情和支持。在学校里我们把爱国主义教育结合在各门课程之中，语文和图画课结合出刊墙报，以提高学生的写作、绘画能力；通过音乐课教唱救亡歌曲，编排活报剧，到群众中去教唱和演出。还油印歌曲装订成小册子连同《民族日报》（当时浙西的进步报纸）由程浩着专人密送德清县城中心小学，并写信动员敌占区学校师生抵制日伪的奴化教育。1940年冬，塘泾集市上贴着一张地主向农民收租的通告，上面写着每亩田收取租米若干斗字样。我对程浩说，‘地主向农民收租用老斗计量不合理’。程浩听了当即取来毛笔，在通告上写了‘一律市斗’四个大字。这样一来，塘泾一带就用市斗计量交租，以减轻农民的负担。据了解，程浩自己家里也有二十余亩土地出租。他能够不顾自家利

益的正义行为是十分难得的……”

1941年春，督学李萼等人从塘泾小学编印的教材、歌曲和刊出的墙报中嗅到了进步气息。他们一再向程浩试探、盘问，程感到事情不妙，就把这情况及时告知谢中波并关照立即离开塘泾。后来周静波亦得知特务将要捕人的信息，可是他身无分文，程浩帮助将两麻袋文件、书刊等秘密转移，并主动筹措路费资助周静波远走高飞。不数日，果然有一帮特务分子闯入塘泾小学进行搜查，结果人去楼空一无所获，于是老羞成怒，将程浩带走，并严加审问。特务们想从程浩的身上找中共地下党线索和证据，事实上是徒劳的。程浩被关押数日后交保释放。（1945年武德工委书记何坚白为此事曾到程浩家访问表扬。）经受这场虚惊以后，程浩仍然心安理得地勤恳办学，师生们照样高唱进步歌曲，并在全防风区的一次歌咏比赛中，塘泾小学的大合唱《齐动枪》获得全区第一名。该校由程浩主持至全国解放。

塘泾是个小集市，塘泾小学规模只是一般而已，而在解放以前风风雨雨的岁月里，这所小校能有进步的倾向，在困难而又复杂的条件下，平凡而认真地教学，为地方培育了数代人。这种为教育事业不计平凡与艰苦的献身精神，当地父老都是不会忘记和加以肯定的。

（原塘泾小学校长程浩及学生
胡尧生提供部分情况）

回忆父亲赵紫宸

赵 萝 莼

我父亲留给我们的传家宝是这样的一个故事：在他十四五岁的时候，他父母让他到平桥头庙里求一枝签，看是到杭州当估衣店的学徒好，还是到苏州去上学。父亲虔诚地祝祷希望上苏州，可恨签上却说是杭州。但是他回家却撒了一个弥天大谎，说是去苏州。这就注定了我们成为一个知识分子家庭。

祖父是个估衣店的伙计，家住德清县新市镇东栅平桥堍。父亲十七岁时奉父母之命结了婚，作为长女的我，就是在新市出生的。在我还是三个月时，全家搬去苏州住，那是1912年。和两个叔叔赵子云、赵之惠，加上他的两位双亲，两位老人常往返于江浙之间的。父亲好学，到苏州最初进的是桃坞中学。从东吴大学毕业后，1914—1917在美国梵德毕尔特大学读书，取得神学士和文硕士学位。他帮助两个叔叔都从东吴大学毕了业，三叔并曾在美国留学。可惜他们都因病英年夭折，伤透了父亲的心。父亲在东吴大学任教授，后来又兼任教务长，1926年受新成立的北京燕京大学之聘，在该校任宗教学学院院长20多年，成为海内外知名的神学家，学者、诗人。

父亲笃信基督教，但却不只是一个一般的信徒。他的信仰有深厚的中西方哲学基础，并植根于数千年祖国灿烂的文化土壤之中。他在燕京时兼任中文系教授，教陶、杜诗。1932年去英国牛津大学讲中国诗词，受到极大欢迎。他在宗教方面的著作中最为人们所知的是《耶稣传》与《圣保罗传》，都是多年潜心

研究的结晶。1938年他自费印行了诗集《玻璃声》，收了旧诗303首，词136首，白话诗21首。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，他1922年就开始写白话诗，收集成书，题名《打鱼》。此后他还写了二千多首诗，可惜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连同他的无数绝佳的书法都烧毁了。现在家里留下的最珍贵的一幅是他67岁那年恭楷书写的诸葛亮《前出师表》、张横渠的《西铭》和文天祥的《正气歌》。

父亲是个热烈的爱国者。珍珠港事件时，他和一些燕京同事被日本宪兵队带去关押了六个多月，后来撰写了《系狱记》和许多诗歌，表现了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。新中国成立前夕，他拒绝了国外的多次邀请，还召唤他在国外任职和读书的儿女快快回到祖国。

1946年美国普林斯登大学二百周年时赠了他一个荣誉的神学博士学位，1948年他在阿姆斯特丹当选为世界基督教协进会六个主席之一，代表东方。但在美国侵朝时因协进会站在美国的立场，忿而辞去了这个职务。

在他退休后的20多年中，他始终读书写作不辍。他曾经用秀丽的工楷自编手抄了一部玉溪生诗集句，上下两卷。他终日手不释卷，钻研中外哲学名著和中国诗词。直到1979年11月逝世，享年91岁。

父亲是个忠厚长者。品德高尚。他终生关心青年们的成长，在家中作风民主。儿女四人都不信仰宗教，但他尊重我们所选择的生活道路。我们敬爱的母亲没有什么文化修养，但他和母亲之间感情非常笃厚。他漫长的一生忠于理想，忠于职守，忠于事业。

（转载《湖州乡情》第15期，1990年1月。作者系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，已退休。）